

L'âge des Foules

[法]塞奇·莫斯科维奇

群氓的时代

许列民 薛丹云 李继红 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新世纪版

精品汉译

L'Age des Poules

让·热内 著 陈圣源 译

群氓的时代

（法）让·热内 著 陈圣源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L'âge des Foules

[法]塞奇·莫斯科维奇

群氓的时代

许列民 薛丹云 李继红 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新世纪
出版

精
品
汉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群氓的时代/(法)莫斯科维奇著;许列民,薛丹云,
李继红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3
(汉译大众精品文库:新世纪版)
ISBN 7-214-03387-9

I. 群... II. ①莫... ②许... ③薛... ④李...
III. 群众心理学 IV. C912.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106301 号

L'âge des Foules

Copyright © 1981 by Fayar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 2003 by JSPPH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Librairie Arthème Fayard

All rights reserved

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10-2002-54 号

书 名 群氓的时代
著 者 (法)塞奇·莫斯科维奇
译 者 许列民 薛丹云 李继红
责任编辑 刘沁秋 余江涛
责任监制 蒋子平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南京中央路 165 号 210009)
网 址 <http://www.book-wind.com>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照 排 南京印刷制版厂
印 刷 者 徐州新华印刷厂
开 本 889×1240 毫米 1/32
印 张 16.125 插页 2
字 数 400 千字
版 次 2003 年 4 月第 1 版 200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214-03387-9/C·73
定 价 29.00 元

(江苏人民版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本社调换)

作者鸣谢

在弗兰克讲座(Franqui Chair)的赞助下,我有幸在卢万大学开设了一系列讲座。本书的内容延续了这些讲座的主题,当然是经过了相当大的补充和整理。在卢万期间,我受到了同事琼-菲利普·莱茵(Jean-Philippe Leyens)的热情款待;感兴趣的研究人员和学生聆听了讲座并提出了宝贵的批评意见,使我获益匪浅。我对他们一并表示深切的感谢。

居住在剑桥大学丘吉尔学院的那段时期,我熟悉了本学科中的许多英文著作,使我能够填补自己现有的文献资料中的一些空白。

内莉·斯特凡娜(Nelly Stéphane)极其友好地阅读了我的书稿,并提出了有价值的建议,我在此也致以诚挚的谢意。

目 录

作者鸣谢	1
导 论	1
第一章 群体研究	16
第一节 个人与群体	16
第二节 民众的反叛	25
第三节 如何面对民众	38
第四节 东西方专制主义种种	53
第二章 勒邦以及对群体的恐惧	65
第一节 古斯塔夫·勒邦其人	65
第二节 群体社会的马基雅弗利	73
第三节 勒邦默默无闻的四个原因	90
第四节 群体的发现	94
第五节 群体催眠术	106
第六节 群体的精神生活	119
第三章 群体、女人与疯狂	138
第一节 群体质料：既冲动又保守的民众	138
第二节 群体形式：既教条又空想的民众	148
第三节 群体领袖	158
第四节 领袖的超凡魅力	167

第五节 宣传策略与群体暗示	179
第六节 结论	196
第四章 领袖原则	202
第一节 群体心理学的悖论	202
第二节 自然群体和人为群体	207
第三节 领袖原则	220
第五章 舆论和民众	237
第一节 交流是民众的镇静剂	237
第二节 舆论、公众和群体	250
第三节 威望的两极化规律	261
第四节 法国的共和政体：从群体民主到公众民主	269
第六章 勒邦和塔德最忠实的信徒：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284
第一节 弗洛伊德博士的著作引发争议	284
第二节 从经典群体心理学到革命群体心理学	297
第三节 群体心理学的三个问题	306
第四节 群体和里比多	314
第五节 社会中情感依恋的根源	328
第六节 情欲和模仿欲	346
第七节 催眠的终结	363
第七章 有魅力领袖的心理学	371
第一节 威望和超凡魅力	371
第二节 群体心理学的基本假设	379
第三节 原始秘密	387
第八章 关于伟人的假说	399
第一节 摩西其人	399

第二节 伟人的家庭罗曼史	406
第三节 缔造一个民族	420
第四节 摩西式领袖和图腾式领袖	434
 第九章 世俗宗教	449
第一节 宗教的奥秘	449
第二节 思想禁锢	458
第三节 父亲崇拜	467
 结束语 全球化的群氓时代	483
 注 释	489
 参考书目	500

导 论

—

我最初想到写一部群体心理学著作是在我承认了这样一个事实之后。无论好坏,这个事实都比别的事实更加明显,也更加让人眼花缭乱。我的意思是说,在 20 世纪初,我们都肯定民众将会取得胜利,而到了 20 世纪末,我们都会成为领袖的囚徒。剧烈的社会动荡一场接着一场,震撼了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并把有魅力的领袖推上权力的巅峰。斯大林、墨索里尼、铁托、尼赫鲁、卡斯特罗,以及他们的那些仿效者完全控制并将继续控制他们的臣民。作为回报,后者则狂热地崇拜他们。如果从民族的层面下降到政党、教会、宗派或者思想流派的层面,我们就会看到,仿效性行为在整个社会机体中都不可压制地产生了相同的结果。

革命取得了胜利,旧制度分崩离析,新旧政权频繁更迭。但是,领袖的崛起却永无尽头。他们在历史上无疑总是可以扮演一个角色,但从来都不是像今天这样的决定性角色,我们也从来没有如此地需要他们。可以这样来表述正在形成中的问题:领袖的这种崛起与平等原则(它是文明国家所有政府的基石)相协调吗?它与民众力量的增强、大众文化的发展,以及知识的传播相协调吗?人们认为这种崛起与现代社会是不协调的,那么它是现代社会中上述特征的不可避免的结果吗?当权力被多数人夺取以后,就暂时被转移到少数人手里,直到某个杰出人物把它从其他人手上夺

过去。他一个人就代表了法律，他能够领导大众进行英勇的斗争，让他们从事巨大的建设工程。他们为他牺牲了自己的切身利益、日常需要，甚至自己的生命。领袖会命令他的一群群追随者去大肆破坏，犯下滔天罪行，而他们总是毫不犹豫地服从。行使这样一种权威难免会剥夺个人的责任和自由。它还会要求人们全力以赴地支持。我们对这些矛盾的结果已经太习以为常了。我们不再感到它们日益沉重的压力。但是，它们还是会让我们感到惊讶，有时甚至是震撼，前提是我们怎样认识它们产生的原因。

我们总是认为这是不言自明的：那种把法律视为某个人的意志的观念已经是过去的事情，只有在谣传中才会听说，最多不过是历史趣闻，就像英雄崇拜或者追捕女巫一样，只有在旧书中才会读到。但是，我们在探讨世界上最古老的问题之一时，却感到难以有所创新。事实是，我们远远没有创新，我们所做的不过是尽量演绎推导一些已知的思想观念，而在那些已经逝去的有着自己的恺撒和暴君的时代，人们对于这些思想观念只是略有所知。我们制定的规则已经能够解释那些例外情况，我们还把他们全凭经验的初步尝试加以系统化，让我们从一开始就明白，在文化、社会和群体的所有不同领域中，已经产生了一种看得见的权力。它在所有方面都受到鼓舞，并被日益赋予人格的力量。我所说的就是领袖的力量。他可能被称为西班牙语中的“lider massimo”，“presidente”或者“caudillo”；意大利语中的“duce”；或者德语中的“Führer”。但是，这些差别无关紧要。因为名称总是描写一个可以指认的实体，词语也总是忠实地对应于现象。当然，在墨索里尼的统治下生活，还是在希特勒的统治下生活，这并不是一回事。同样，在铁托与斯大林之间、卡斯特罗与皮诺切特之间，以及甘地与苏加诺之间，选择的结果也是不同的。准确地说，每种情况都是独一无二的，其具体形式的差别就像兄弟姐妹之间的差别一样。但是，随着领袖而来的还有一种新的政治成分，以及由此而来的新文化特征。这种

特征存在范围之广,影响力之大,都是史无前例的。到历史上去寻找类似情况显然于事无补。

上述这种新颖性还只是第一点。第二点是,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都教导我们去发现隐藏在历史事件和人类行为后面的非个人的原因。他们向人们说明了经济技术的客观规律是怎样支配我们的。他们还向人们展示了,在所谓伟人的机制后面,还有人民的劳作以及控制工业和金融的人们的创造性活动。他们让我们警惕有关英雄的神话,即认为英雄是上帝派来的,其出现足以改变历史的进程。但结果怎样呢?我们如果放下他们的著作,把目光投向历史舞台,就会看到这种神话至今还大有市场。庆典、游行和演讲等仔细排演的礼仪正在使英雄的神话死灰复燃。人们在露天运动场,或者阴森的大型建筑物中参加规模巨大的集会,其场面要远远超过古罗马或中国皇帝们组织的庆典。理智告诉我,这种壮丽辉煌是一种幻觉,即使在电影院或者电视荧屏上看到整个世界都在场,也是如此。但是,就像世人一样,我也相信眼见为实的道理。这些引人注目的礼仪和壮观场面已经成为我们文明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就像古罗马的竞技场一样,它们都满足了某种需要。它们对于民众心理和社会生存都有重要意义。在历史舞台上,发生的每一件事都有个人的原因,都被归因于伟人的杰出才能和素质。不管是成功的革命,科学的进步,史无前例的生产记录,降雨或者疾病的治愈,士兵的英雄行为,还是艺术灵感,都是如此。天才的主观规律解释了社会现象和历史趋势,就像斯大林和墨索里尼那样。人们都在叹息词语的贫乏,叹息如此多的最高级修辞方式仍然不足以表达天才们的无限伟大。

在多数情况下——我刚才提到的那些情形也绝非罕见——领袖们都被赋予特殊的使命。他们被认为是人们期待已久的救世主,将把人民带往上帝允诺的乐土。尽管有一两个头脑清醒的人士的警告,民众们依然总是通过那些所谓的领袖来理解自己、发现

自己、认清自己的本质。他们敬仰并崇拜那些人，好像那些人是全知全能的超人，能够通过人格的支配力量来利用人。在迷乱和敬畏之中，他们把这些现代的琐罗亚斯德变成了半神人，认为他们的每个判断都正确无误，每种行为都公平合理，每句话都真实不虚。这些半神人的力量最初在环境的压力下产生，然后在玩弄权术中增长。这种力量后来又具备了一种制度的形式，自动地获得了普遍的应用。结果，在整体社会中，一个有威望的指挥官（或者是有魅力的领袖，如果你喜欢这个词的话）的社群就形成了。它比那个更广阔的社会要小，但是却具有更大的动力和更强的意志。它可以毫不费力地操纵世界，而这个世界对此甚至一无所知。

二

这种现象，单就其规模而言，就已经足以让社会科学的大多数学科和理论惊讶不已。当它在欧洲产生时，或者更准确地说，在意大利和俄罗斯第一次产生时，思想家们都不能接受他们目睹的事实。有些人认为这是人的思想的一种病态的失常；有些人则认为这是发展过程中转眼即逝的身心失调。但是，它更主要地还是被视为一种必需的权宜之计。维持资本主义世界的社会秩序，或者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催生新秩序都不能缺少它。它似乎是一种酵母，因为正如柏拉图所说，专制独裁被称为是更容易产生急剧变化的政府形式。当然，没有独裁者就没有独裁统治，甚至连多数人的独裁也不会有；而没有滥用权力和犯罪行为，就不会有独裁者，不管他是叫斯大林还是叫波尔布特(Pol Pot)。很快就有人指出，这种事情是为实现某个目标而产生的偶然错误或者偶然事件，它们总体上还是促进了人类进步和民族解放，并将继续如此。

只有一门学科从一开始就是专门研究领袖权力这个棘手课题的。事实上，这门学科产生的目的就是要将对领袖权力的研究作为其惟一的课题。这门学科就是大众心理学或者叫群体心理学。

远在人们想到此类事情之前,群体心理学就已经预见它们的出现。它有时候也不情愿地为领袖权力的增长提供了实践的以及知识性的工具;等到领袖的权力胜利之后,群体心理学就起而与它进行斗争。在领袖权力的这种崛起及其表现中,群体心理学看到了现代社会的一个特征,看到了人类新生活的一个预兆。令人惊讶的是,甚至在今天,我们依然相信我们可以无视这些思想观点,可以将它们弃置一旁。它们当然是有价值的,因为正是有了它们,我们才能够描述和阐明其他学科甚至从未觉察到的现象。因为他们认为这种现象是不可思议的,所以对此也就熟视无睹。然而,正如我们在这整本书中将看到的,它们的影响是非常可观的。我会毫不犹豫地,说,群体心理学以及经济学是两门为人类历史的创造提供了观念思想的学科。我的意思是说,它们以具体的方式在我们时代的历史进程中留下了印记。而与此相比较,社会学、人类学以及语言学不过是被历史所创立的科学。

群体心理学认为,经济或者技术的因素无疑增强了领袖的权力。但是有一个具有魔力的词,它本身就表明了权力的真正原因,那个词就是**群体**(mass),或者更准确地说,就是**民众**(crowd)。自从法国大革命以后,它在流行的演讲中就一再出现。但是一直要到20世纪,我们才能说出它的准确含义,并赋予其公认的科学性。民众就是由平等的、无名的以及类似的个人组成的变化中的集合体,其中每个个体的思想和情感都会同步地表达出来。

一个群体或者一群民众就是摆脱了束缚的社会动物。道德的禁忌松弛了。人与人之间的差别消失了。人们通常都在暴力行为中表达他们的梦想、他们的情感,以及所有的英雄主义、野蛮残暴、希奇古怪和自我牺牲。一个骚动的、情绪高昂的群体,这些就是人群的真正特点。它也是一股盲目的不可控制的力量,能够移山倒海,克服任何障碍,甚至摧毁人类几个世纪所积累的成就。

随着社会纽带的瓦解、通讯交往的迅捷、人口的不断混杂,以

及城市生活不断加快的、令人疲惫的节奏,人群的聚合体也在不断地形成和瓦解。它们一般被分解还原到原子构成的层次,然后又被重新组成不稳定的、甚至更加庞大的群体。这种现象发生的规模至今还不为人知。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它在历史上绝对是新生的事物。它也解释了为什么在群体发生重要作用的文明中,个人会失去他存在的理由及其自我感觉。他成了一个局外人,在其他个人组成的机器上发挥一只无足轻重的螺丝钉的作用,而他与其他个人的关系完全是机械的、非人际的。结果,每个个人心中都产生了不确定性和没有目标的焦虑感,觉得自己成了未知的、充满敌意的势力的玩物,由此还产生了他对理想和信仰的追求,以及对一个榜样的需要,以便帮助他获得自己渴望已久的完整性。弗洛伊德所说的民众心理的悲惨景象在全世界都是一样的。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有威望的,或者是有魅力的领袖在他们中间建立了强有力的联系。他们的使命就是把人群聚集起来。他们作出了一个榜样,提出了一种理想,并且回答了生活怎样才能有意义的问题。在我们这样一个时代里,人们不再有整体的自然观,也不再有任何一个社会榜样或者我们那些正在消逝的宗教,来有效地解释我们为什么要活着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而这却是一个非常突出的政治问题。

总之,一种集体生活形式的诞生总是伴随着一种新类型的人的出现。相反地,一种集体生活形式的衰亡也总是伴随着某种类型的人的消逝。我们生活在一个大众社会(mass society)和大众人(mass men)的时代里。每个必须指挥、管理其伙伴的人都具有一些共同的素质,而领袖必须把这些素质与其他更有魔力的先知的素质结合起来,去唤起羡慕和热情。民众们就像是一堆码好的砖块,略经风雨就会坍塌,因为没有任何东西把它们粘合起来。领袖让每个人都感到与他有一种个人的关系,使他具有人们已经认同的思想和世界观。这样,他就有一种人为的与人同在、团结一致的感觉,以及一种面对面的人际关系的幻觉。而要做到这些,只需要

一两幅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图像，一两个动听的、充满激情的信仰表白，或是让人想起某个伟大的集体信念。这就是团结个人，支撑民众大厦的粘合剂。壮观的庆典、频繁的大会、力量和信念的显示、一致通过的计划，等等，所有这些都组成这样一种机制，以确保所有力量都被集中起来，确保集体意志至高无上，并且创造了一种喜剧性的欢乐气氛。

领袖就从这人海中涌现出来，接受他们的奉承和效忠。他的形象让人疯狂，他的话语充满魅力，他唤起的敬畏感感染每一个人。对于由孤独的、原子化的个人重新组成的群体中的大多数人来说，他就是体现为个人的民众。他使这个群体有了他的名字、他的形象，以及他的积极有为的意志。

拿破仑就为法国革命军队中的士兵作了这种出色表演。斯大林也在全世界共产主义者中成功地展示了米什莱(Michelet, J.)^①所谓的“人民与一个领袖的心心相印”。他们为民众提供了榜样，并且确保民众对他们无限忠诚。把一个庞大的人群转变成为一个单一实体，这给了领袖一种可见而又不可理解的吸引力。从那种有害的结合中，出现了一个完整的、具有强烈感染力的人格。一旦领袖说话或行动，它就会屏息驻足。但是，为取得这种效果而使用的技能首先是心灵，然后是信仰，最后还有希望。理智只起着非常次要的作用。在这个民众组成的社会中，只要仔细看看动员民众的艺术，我们会明白，政治乃是被复兴的宗教。

三

现在，我们要用群体心理学来考察，是什么东西把领袖与他的民众联结得就像一个人与其影子一样。毫无疑问，那就是权力。

^① 米什莱(1798—1874)，法国历史学家，认为历史就是人类反对宿命、争取自由的斗争史，主要著作有《法国史》、《法国革命史》等。（本书的页下注如不加说明均为译者所注。——编者）

人民从掌权者手中夺取了权力，把它掌握在自己手里。领袖对权力的贪婪就像一个宗教信徒对永生的贪婪一样。事实上，他对权力的追求开始于一种奉献的精神。他想消除历史上所有的不公正，重建国家的权威，获得一些手段来矫正低效浪费的经济，为没有特权的人提供福利，以免他们陷于悲惨的境地。等到一个充满危机、战争或者革命的时期结束时，这样的规划将需要效率，以及对公共事务更加娴熟的管理技能。

人们通常都认为，哪里出现了无政府状态，哪里就会混乱一片。无政府这个词的准确含义就是缺乏权威，无论是一个人的权威，还是一个政党的权威。这是一种对事物的错误观点。但是，无论哪一类领袖，都会利用无政府状态来增强自身的权力，并借此削弱他的竞争者。他运用的手段就是把社会制度和社会生产重建在更加坚实的基础上。这方面的成功使他能够集合民众，使他们把他的奋斗视为自己的奋斗，并且要求他们作出必要的牺牲。

第一种牺牲就是放弃对权力的控制，放弃自由所带来的满足。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帮助他，帮助那些亲近他的人以及他的追随者，使他们能够更好地发号施令，而民众自己则能更好地服从他们。这样做也是为了用最简捷的方式达到目的。领袖就是这样通过使用权宜之计以及一些非法手段来加快夺取权力的步伐。民众们也对监视、怀疑以及压迫等非正常的程序表示信任，予以授权和赞同。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其他领域中。最初，原则得到了尊重，但随后就被弃之一边。开始看起来，这好像只是权宜之计，但最终领袖却永远地抛弃了职责。就像历史已经见证的那样，拿破仑抛弃了立法大会，斯大林抛弃了苏维埃。

与所有这些阴谋诡计紧密相关的，就是以领袖为核心，刻意地宣传并贯彻那些把他带上权力顶峰的思想理论。没有这些思想理论，所有的老虎都是纸老虎，所有的权力也都不过是昙花一现。每一场选举，日常生活中的所有活动，如工作、恋爱、追寻真理、阅读

报刊,等等,都变成了投给领袖的无数信任票。结果,领袖的权力,无论是来自民众的同意,还是得之于军事政变,似乎都依赖于普遍的选举权。换句话说,就是都具有某种民主的形式。我们应该记得,甚至希特勒和斯大林成为政府首脑也是通过了适当的选举。但他们随后就诉之于政变。总之,在所有此类情况下,社会无政府状态被消除了,取而代之的是暴力和服从。

东方人所谓的人格崇拜以及西方人所谓的权力的人格化,尽管差异巨大,但是它们都不过是同一种交易的极其不同的变种而已。人们每天都在放弃他们行使主权的职责,并在每一个民意测验和每一次选举中批准领袖们的行动。而对于领袖而言,他们所争取的就是每天都可以行使他自以为拥有,但却从来没有明确赋予他的权力。勒邦(Le Bon)所谓的“民众的领袖们”都能娴熟地进行这种交易,并确保其条款被人们诚心诚意地接受。民众们的这种做法,结果是完全印证了政治社会的一个基本原则,那就是**民众理而不治**(the mass reigns but does not rule)。

四

关于民众,还有一个难解之谜。当代社会思想的谨慎压制了我们的好奇心,而阅读经典作家的著作又使其得以存活。我们能够心照不宣地忽视这种奥秘,可以使它变得软弱无力,甚至把它逐出我们的头脑,但是我们不能永远消除这种奥秘,或者把它摧毁。苏联哲学家季诺维也夫(Zinoviev, A.)^①不久前在他的著作《没有幻想》(*Without Illusion*)中写道,群体心理学的这种现象通常都逃过了历史学家的注意。他们认为这些都是次要的现象,没有在上历史上留下任何痕迹。而事实上,它们真的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季诺维也夫的话真是恰到好处,再简洁不过了。群体心理学的先

^① 季诺维也夫(1922—),前苏联讽刺作家、数学家、哲学教授、持不同政见者。